

图像与风格

故宫藏传佛教造像

ICONOGRAPHY AND STYLES
TIBETAN STATUES IN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博物院编
紫禁城出版社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像与风格

故宫藏传佛教造像

上



故宫博物院编
紫禁城出版社



图像与风格

故宫藏传佛教造像

ICONOGRAPHY AND STYLES

TIBETAN STATUES IN THE PALACE MUSEUM

故宫博物院编
紫禁城出版社

Edited by The Palace Museum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造像 / 故宫博物院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6

ISBN 7-80047-403-8

I . 图… II . 故… III . 喇嘛教—佛像—中国—图集 IV . B946.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710 号

编 著 罗文华
翻 译
摄 影 刘志岗 赵 山 马晓旋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万 钧

图像与风格

——故宫藏传佛教造像

故宫博物院 编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内)

北京瑞宝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 1/16 印张 31.5 字数 180 千字

彩色图版 400 幅

2002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 7-80047-403-8/J · 194

定价：480.00 元

目 录

藏传佛教神系的形成与完善	7
英文摘要	22
造像特征释图	25
图版目录	34
英文图版目录	38
图 版	
本初佛与五方佛	42
本 尊	100
般若佛	158
菩 萨	242
女 尊	352
护 法	414
参考书	472
造像年代检索	477
专有名词检索	483
后 记	504

CONTENTS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IBETAN PANTHEON	7
ENGLISH SUMMARY	22
SKETCHES OF MAIN MUDRĀS, ĀSANAS AND SYMBOLS OF THE DEITIES	25
COMMENTARY ON PLATES 1-217	
Ādibuddha and Dhyānibuddhas	42
Yi-dam	100
Buddha	158
Bodhisattva	242
Feminine divinities	352
Dharmapāla	414
BIBLIOGRAPHY	472
THE INDEX OF THE SELECTED SCULPTURES BY CHRONOLOGY	477
TERMINOLOGIES	483
POSTSCRIPT	504

藏传佛教神系的形成与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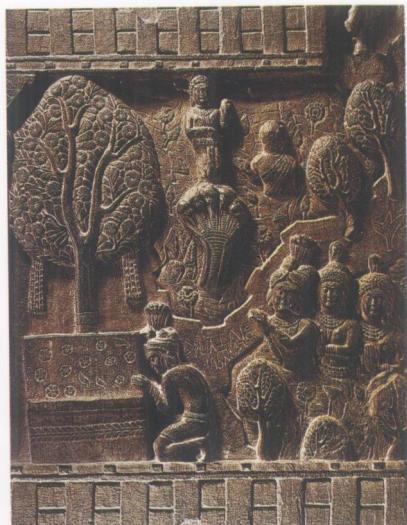
一、大乘佛教诸神的涌现（公元1—6世纪）

印度学者每当论及某尊神的变化形象及神格完善过程时，必自四《吠陀》(Veda)、《梵书》(Brāhmaṇa)、《奥义书》(Upaniṣad)、二大史诗[《罗摩衍那》(Mahāyāna)、《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摩奴法典》(Manu-smṛti)、《富楼那书》(Purāṇa)等等一一征引，纵论从吠陀时代到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中的各种变迁，充分展示其对自身文化的熟悉和娴熟的梵文阅读能力，令人眼花缭乱。的确，印度自古以来就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思想和多神崇拜的传统，直到现在。佛教初期对神的观念曾经进行了强烈的抵制，佛陀时代神的观念受到排斥，不崇拜神像，这在当时印度宗教界都是独行卓立的举动，令人侧目。从现存早期佛教遗迹来看，如著名的桑奇(Sanchi)、巴尔扈特(Bharhut)和阿玛拉瓦提(Amaravatī)古印度三大塔的雕刻中，佛陀总以象征物的形式出现，如法轮、伞盖、宝座、足印、菩提树等，只有一些低级的精灵魔怪一类的传统形象作为陪衬出现，如夜叉(Yakṣa)、摩罗(Māra)等。但是在佛陀以后的时代里，独立于印度传统之外的特性使之面临着生存和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佛教改革势在必行，于是大乘佛教应运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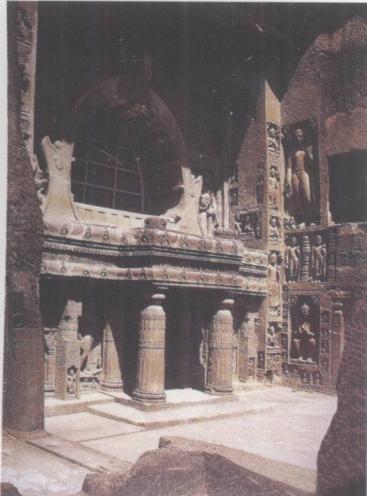
公元初年，在犍陀罗(Gandhāra)和摩菟罗(Mathurā)两大艺术流派中，先后出现了佛陀的造像，这是佛教改革派大乘佛教思想在众多信徒集团中酝酿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出佛教已经重新被纳入了神灵崇拜的传统之中了，对偶像崇拜的需要已经成为普遍的愿望。于是造神运动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数量剧增，而且各类神像千姿百态，日趋复杂。

各种资料表明，大乘佛教时期，佛教造神并没有系统化，也就是说，佛教的神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们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神祇，或就地取材，从印度教中直接借用。但是诸神出现很分散，相互间的关系并不明确，不同神的地位高下也不分明，更多体现的是功能的不同。早期经典，如《般若经》、《华严经》、《法华经》和净土经典《阿弥陀经》以及随后出现的小本《阿弥陀经》确立了观音菩萨、毗卢佛、三世十方佛、无量寿佛、无量光佛等信仰，将小乘佛教一时一佛的思想扩展为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皆有不同佛的存在和佛的世界存在的众神思想，毗卢佛已经作为法身——永恒抽象的真理而成为佛法的象征，阿閦佛成为如来的新成员。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在经典中提到，并被赋予了拯救众生的众多职责和丰富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受到信徒的喜爱，发展最为迅猛。佛教的神众日益丰富起来。

从中国去印度取经的僧人的游记中可以看到这种神众增广的趋势。



伊罗钵龙王礼佛(公元前2世纪末 印度)



阿旃陀石窟第19窟正面
(公元5世纪 印度)

东晋僧人法显（394—414年）提到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和未来佛弥勒。唐代僧人玄奘（629—645年）提到观音菩萨、诃梨帝母（Hārītī）、地藏菩萨、弥勒、文殊、莲花手观音、毗沙门天王（Vaiśravana）和阎魔等。

在艺术作品中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犍陀罗风格的作品中有佛、布禄金刚、库贝罗、帝释天（Indra）、弥勒、诃梨帝母等；在摩菟罗风格的作品中，多见到库贝罗、夜叉、龙神等形象。而在早期的阿旃陀（Ajantā）、埃罗拉（Ellorā）和坎赫里（Kāñherī）等著名石窟中，菩萨的形象十分丰富，但是各位神祇的特征并未完全区别开来，如观音与弥勒往往混淆，佛身边的侍从菩萨特征不明等均说明此时神系思想从理论到实践均未臻成熟。

二、密教诸神的繁荣（公元7—13世纪初）

完备丰富的佛教神系的建立应该是在佛教密宗（怛特罗佛教、金刚乘佛教）出现以后的事，即公元7世纪以后。最早的密教经典可以举出《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Mañjuśrimūlakalpa）和《一切如来金刚三业最上秘密大教王经》（Guhyasamājatantra），后者也称为《秘密集会怛特罗》（Tathāgataguhyaka），印度学者将其起源追溯到公元二三世纪。他们经过对比以后认为，更早一些的《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中并没有明显的神系建立的思路，而在随后的《秘密集会怛特罗》中十分理性化、系统化的佛教神系建立起来了。经中第一次描述了五方佛及其各自的真言（咒）、曼陀罗、明妃等。五方佛象征五蕴（skandha），分别作为五部诸神之父、之主¹。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和领属关系可以从造像中菩萨与护法冠髻中出现的所谓“化佛”形象看出来。日本学者认为如此完备的体系和成熟理论构架，出现于公元二三世纪，却迟至公元7世纪中叶才广为人知，无论怎样解释都难免有些苍白。根据他们的看法，此经应是公元8世纪以前成形，公元9世纪才最后成书²。综合印度佛教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肯定在公元7世纪以后，以五方佛为核心的佛教神系已经基本建立。

五方佛是由多个小系统组成的复杂的综合神系。在这个体系下，佛教诸神、外来神被纳入以毗如佛（佛部）为中心，统率阿閦佛（居东方）、宝生佛（居南方）、阿弥陀佛（居西方）、不空成就佛（居北方）所组成的完整的佛国神系中。五佛中不同方位的佛居不同的佛国中，各自又有自己的菩萨、明妃、护法等眷属，组成一个次佛国系统。五方佛的成员具有不同的神格，如阿閦佛属金刚部，具有破坏威猛的特点，所以许多的护法神和密教修行中的本尊神多被视为此尊所派生，为其“法子”；宝生佛属宝部，具有财富神的特性，其所属的菩萨、护法也无一例外，具有同样的神格；阿弥陀佛属莲华部，佛教中的寿神多与此尊有关，如无量寿佛、度母等。五方佛系统的建立不仅在佛教尊神数目急剧增加后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化整理，而且明确了众神的神格和功能，这样有利于佛教对付印度教神系日益强烈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佛教从印度教、耆那

教中借用诸神，改头换面后迅速纳入佛教体系中。

从印度教、耆那教中引进尊神只是佛教大规模造神运动的一个手段。随着佛教密教化步伐的加快，咒语（真言）、曼陀罗的仪仗和所有观想对象、哲学名词等无不神圣化成为具像的尊神。在密教中心的东北印度和孟加拉地区，密法修行成为风气，许多的密法在流行，大量的尊神由此产生，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密法，由于观想者的能力、心境、环境、要求的不同，观想产生的本尊及其眷属特征也不相同，因此，同一尊神出现众多的变化身。当他们将自己的修行结果记录下来作为密法流传时，这就是所谓的成就法的著作，这些成就法的著作成为密教艺术造像重要的经典依据和素材来源。

密法的盛行，尊神的繁荣，将五方佛严整的格局打破，首先，毗卢佛作为佛部主尊，其温和的神格已经不能适应密法修行的要求，更有威慑力的金刚部部主阿閦佛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无上瑜伽部部主，金刚部的尊神数目迅速膨胀，位居至尊。另外，面对当时西北地区伊斯兰势力的扩张，佛教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如何在佛教哲学上作出反映是当时的大势所趋。在佛教神系上，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变，以便与伊斯兰的教义相抗衡。10世纪左右，以时轮乘为代表的一神教在印度大陆流行。此派信仰“本初佛”，认为通过这种信仰可以从现在、过去和未来的限制中解脱出来。本初佛的理论还未完全成熟，12世纪末，佛教在伊斯兰军队的打击下逐渐从印度消失。

从佛教艺术史的角度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数目是十分惊人的，而且每每有一些前所未见的尊神出现，这一点从这一时期印度佛教梵文手卷的插图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由于战火的无情，这一时期很多的作品或残缺不全，难以辨认，或者完全消失，无缘再见。要讨论这一时期密教神系和图像学的发展状况，现代学者主要参考两部保存至今的最重要的十二世纪的梵文写卷：《成就法鬘》(Sadhānamālā) 和《究竟瑜伽鬘》(Niśpannayogāvalī)。

《成就法鬘》³共由312个成就法组成，收集了印度后期金刚乘诸尊的成就法和实践修行的怛特罗经典，包括《三三昧耶成就法》(Tri-samaya-rāja-Sādhana)、《金刚座至尊成就法优波提舍仪轨》(Vajrāsana-bhāttāraka-sādhanopadeśa-vidhi)、《圣六字母大明成就法》(Ārya-ṣadakṣarī-mahāvidyā-sādhana) 等，不仅有大量佛教尊神的描述，依佛、菩萨、诸尊等顺序排列，还包括真言（咒）、实践密法修习的过程、曼陀罗以及怛特罗哲学等方面内容的记载。此经典不仅成为佛教图像学研究的基本经典，也是了解7世纪以来孟加拉地区在伊斯兰军队入侵和佛教崩溃前夕（12世纪末）印度本土佛教真实状况的珍贵原始资料⁴。

《究竟瑜伽鬘》⁵收录了26个曼陀罗，并对其中的每一尊神作了详尽描述，是最为丰富和详备的图像学资料，成为印度佛教灭亡以后尼泊尔和我国西藏地区佛教曼陀罗修行和绘画时最具经典性和权威性的资料⁶。这一点在12世纪以后佛教活跃的地区之一尼泊尔的艺术作品中



4b



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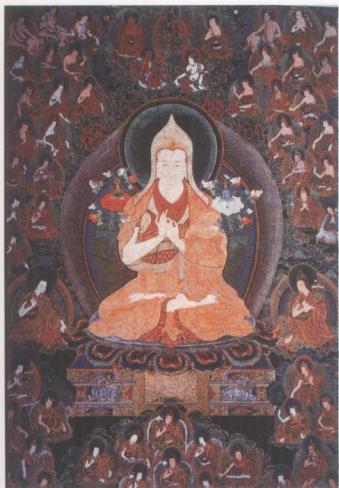
《究竟瑜伽鬘》梵文抄本（12世纪末 尼泊尔）

可以发现。尼泊尔艺匠们把此书和其它一些相应的经典作为曼陀罗诸神描绘的基础，在他们创作的曼陀罗作品中，尊神的特征多与此书的记载相符。如，在加德满都城西北端，尼泊尔最重要的斯瓦雅善那特大塔（Svayambhūnātha Stūpa）东面有一个法界语自在曼陀罗（Dharmadhātuvāgīśvara-maṇḍala）铜碟，曼陀罗上塑二百多尊像；在潘坦（Patan）地方的哈卡·巴哈勒（Hakā Bahāl）的后院中，有一个大铜碟也表现了法界语自在曼陀罗，其中半数尊神均是用象征物来代表⁷；在加德满都城内的寺庙中，还有其它各种曼陀罗，如除恶趣清净曼陀罗（Durgatipariśodhanamaṇḍala）和金刚界曼陀罗（Vajradhātumāṇḍala）等，或刻在石上，或见于铜碟上。这些曼陀罗是对《究竟瑜伽鬘》最忠实的表现。

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发现的那样，这两部经典的编纂年代约在12世末，其所反映的佛教图像学资料多限于印度怛特罗佛教（公元7—12世纪）的情况。其中的一些尊神在实际造像中并未见到，而现存实物造像中的一些形象也未见于两部经典中，反映出这两部经典在时代和地域上的局限性。

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以后，在尼泊尔和西藏地区仍得到大规模发展，图像学和神系的发展更趋复杂。印度教与佛教神灵共享的现象更为普遍，而且密教化的程度很深，其造像与绘画均有更多的神秘特色，加之尼泊尔工匠的艺术气质和传统的娴熟工艺技术，创作了大量精巧的佛教艺术品。在尼泊尔，佛教与印度教更紧密的结合，更多新的尊神产生出来，或由旧尊神演变出来。尼泊尔工匠创造了大量印度本土不曾有过的尊神和神格，他们对这些尊神的图像学特征耳熟能详，世代相传，直到今天仍在继承。帕特恰雅惊叹尼泊尔的寺廟建筑雕刻简直是佛像的博物馆。

三、西藏神系的构建（公元8—19世纪）



布顿大师像（17世纪末 西藏）

在西藏，印度的传统几乎被完整地继承下来。1322年，布顿大师在他的名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中将所有西藏密典按照密教四部的原则作了全面的划分⁸，分为事续、行续、瑜伽续、大瑜伽续。其中大瑜伽续即是无上瑜伽续。无上部又分为大瑜伽方便续、大瑜伽智慧续、方便智慧无二续。西藏各教派也依此原理作了相应的发挥。古老的宁玛派将“九乘”之说作为重要的教义之一。所谓九乘包括：一声闻乘，二缘觉乘，三菩萨乘，四作部，五行部，六瑜伽部，七大瑜伽品，八无比瑜伽品，九无上瑜伽品。其中四至九乘属密乘诸部，所不同的是将无上部分作大瑜伽、无比瑜伽、无上瑜伽三品；萨迦派将无上部分作父续、母续、无二续三部。明初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针对各派忽视下三部（事、行、瑜伽）修习和戒律的弊病，倡导改革，对无上瑜伽部作了进一步的修正，将其划分为父续和母续而不承认无二续的存在。这



彩绘本《五百佛像集》
(19世纪 瑞士苏黎世大学民俗学博物馆)

种经典划分的不同体现了西藏各派对庞大的佛教经典在修行次第中所起作用在认识上的差异，同时，反映出各派在对佛教神系的构架进一步清晰化、条理化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即：根据各派教义中不同的密教经典各自的归属以及它们在密教修行中的地位，来分别确定与这些经典相关的尊神在神系中的地位与神格，同时保证所有的尊神均被纳入此体系中。由此，藏传佛教宏大的密教神系得以最终完善。这个神系的创立是在印度，但是它的最后完成无疑是在西藏，这是藏传佛教对后期佛教发展的贡献。

印度后期密教成果在西藏译师们的长期不懈努力下，大量编译出来，保存在西藏大藏经丹珠尔部中。如梵文本中《成就法集》是多卷本的著作，保存下来的仅有《成就法鬘》一部，而在藏文大藏经中，共收录了四类⁹，其中影响最大的第三部分即是《成就法集》¹⁰。

16世纪觉囊派大师多罗那它(Tāraṇātha) (1575 – 1634年?) 编成《本尊海成就法宝源》(Yi-dam rgya-mtsho'i sgrub-thabs rin-chen 'byungs-gnas)一书，除了收录西藏旧译的成就法以外，还补充了他新译的成就法内容。此书由七世班禅丹必尼玛(bsTan-pa'i nyi-ma) (1871 – 1853年)再次充实和蒙古学者洛桑诺布歇热(Čin süjügtü qayan Blo-bzang nor-bu śes-rab)的注疏，最终完备，书名简称《宝汇》(Rin-lhan)¹¹。此著述极受西藏佛教图像学研究者的重视，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G. Tucci)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将它与《成就法鬘》相提并论¹²。

由于藏蒙学者整理、注释和宣传，《宝汇》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嘉庆十五年(1810年)七世班禅喇嘛为蒙古王公贵族及僧众数百人开启本初佛曼陀罗四种灌顶(abhiṣeka)。仪式之后，众人要求将《宝汇》绘图并刷印出版。后由蒙古艺人根据成就法的主尊绘成图像，并开版印刷¹³，题名曰：《宝生纳塘百法金刚鬘所述之绘像：利见住》(Rin-'byung snar-thang brgya-rtsa rdor-'phreng bcas-nas gsungs-pa'i bris-sku: mthong-pa don-ldan bzhugs-so)，共分三部分：即《宝生》(Ring-'byung)、《纳塘》(sNar-thang)和《金刚鬘》(rDor-'phreng)。其主要部分《宝生》所依据的经典即是七世班禅所编订的《宝汇》。从1至144叶，每叶三幅图像，共432幅，背面为真言(咒)。另外两个部分为《纳塘》(即《纳塘百法》sNar-thang brgya-rtsa)和印度阿闍梨阿帕亚柯罗·笈多(Ābhayākaragupta)所著《金刚鬘》。《纳塘百法》从1至13页，第1、12页只有一幅，第13页没有图像，共32幅。《金刚鬘》从1至20页，第17页只有2幅，18至20页没有图像，共50幅，合计514幅¹⁴。其中一些画面包含不止一尊，故尊神总数远在此数之上。这本图像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百佛像集》。

此图像集为西方所知甚早，后经欧洲和东方学者不断搜集新版本，反复校勘出版，已经成为学者研究案头必备参考书¹⁵。

需要提醒的是，故宫六品佛楼(西方学者知道的宝相楼)内部悬挂的唐卡和供奉的小铜像均与此集有关(详见下文)。而且，内贝斯基(René de Nebesky-Wojkowitz)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就大量使用《宝



三世章嘉像（18世纪末 故宫博物院）
当然以为它与纳塘有关。

生》部分的成就法资料¹⁶。

尽管此集在西方一版再版，很多学者都使用过其中的资料，但是对此集仍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存在，而且迄今仍被部分学者一再使用。

从潘德（E. Pander）开始就误认为此书是在西藏纳塘出版的，至少现在仍有不少人还以为此书是西藏刷印的图像集，尤其是一些西方著作中常用纳塘五百佛像集的书名，更是明显的误导。即使是名著《两种喇嘛教神系》也未能免俗。其错误可能是来自于其中的《纳塘百法》部分的题名，想当然以为它与纳塘有关。

根据其内容《五百佛像集》的《宝生》部分主要包括：

1. 初起尊: 1-4a(阿拉伯数字代表叶码数, abc 代表一叶中的左中右三尊位置); 2. 无眷属如来: 4b-16; 3. 曼陀罗主尊: 17-24c; 4. 金刚亥母及眷属: 25-32; 5. 观音: 33-43; 6. 度母: 44-54b; 7. 金刚手: 54c-57; 8. 马头金刚: 58-61a; 9. 不动金刚: 61b-63a; 10. 长寿尊: 63b-65a; 11. 智慧尊: 65b-68; 12. 金刚座保护尊: 69-70b; 13. 大力金刚母: 70c-72; 14. 杂尊: 73-81b; 15. Śākyarakṣita 传承诸尊: 81c-94a; 16. Sūryagupta 所说 21 度母: 94b-102b; 17. 财宝尊: 102c-115; 18-20. 大黑天: 116-133; 21. 怖畏天母: 134-137a; 22. 阎魔和阎咪: 137b-139b; 23. 结束尊: 139c-142c。

显然《五百佛像集》的排列是以成就法的内容为原则的，这是《成就法鬘》的传统，对我们研究西藏成就法和图像学有极大的帮助。绝大部分的西藏尊神均可以在此书中找到。

另一部早于《五百佛像集》出版的重要代表性的图像学著作《三百佛像集》是一种新体例的开始，代表了藏传佛教图像学很多观念上的创新，其体例为清宫的《诸佛菩萨圣像赞》一书所继承。

《三百佛像集》的出版与乾隆帝的国师三世章嘉胡土克图（1717 – 1786 年）有密切关系。章嘉转世系统是康熙时期册封的国师，内蒙古地区最大的转世活佛，佛教领袖。三世章嘉幼年奉诏进京，进入宫中学习佛法，精通满、蒙、汉、藏、梵等多种文字，佛学造诣极深，在驻京喇嘛中位居上座，与乾隆帝结下深厚友情，并对清宫藏传佛教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百佛像集》全名为《上师、本尊、三宝、护法等资量田——三百佛像集》（Bla-ma yi-dam mchog-gsum bka'-sdod dang bcas-pa'i tshogs-zhing gi sku-brnyan sum-brgya'i grangs-tshang-ba）¹⁷，成书于乾隆时期（1736 – 1795 年），可以肯定此书刊行于北京，时间约在乾隆三年至二十二年（1738-1757 年）间¹⁸。尽管没有汉文题记，但是在每一叶的边框外有汉文叶码编号，而且民国时期经版还保存在嵩祝寺天清蒙藏番经局，可能从乾隆时期到民国时期一直在刷印。此图像集没有汉文本，仅有蒙文和藏文，极可能仅限于北京的蒙古族藏传佛教僧侣中使用¹⁹。学术界普遍认为此集的编者就是三世章嘉国师若必多吉²⁰。潘德最早对此集作了研究，并发表了论文²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此，《三百佛像集》在欧洲、印度、中国前后数次再版，其中以北京法

源寺的版本最全²²。

根据蒙、藏文前言记载，三百尊神分成七大类，即上师（印度祖师、西藏祖师和大成就者）（1—18叶）、本尊（19—23叶）、佛类（33—48叶）、菩萨（49—64叶）、声闻缘觉（罗汉）（65—70叶）、勇士空行母（71—76叶）和护法（77—100叶）等七类²³。这明显继承了《成就法鬘》的构架，结构严谨，分类清晰，显然是根据章嘉国师的原则从大量成就法经典著作中选出重要的尊神作出的精心编排，打破了传统的以成就法为主题的图像编排方式。

《五百佛像集》和《三百佛像集》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将经典所载的尊神表现出来。前者是以成就法为主，将有关尊神描绘出来，后者将成就法或曼陀罗中的尊神挑选出来，分门别类，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学者研究和分类佛像时基本原则。可以说，藏传佛教所有图像学的著作均离不开这两种模式，前者是印度佛教传统的继承，是各种成就法经典主尊图像的总集；后者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通过对众多尊神的取舍排列充分体现了自己所属教派的观点，对清宫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印度佛教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和神系，经过蒙、藏学者的努力，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许多的本土神，如四季女神、贝格遮、八宝女神等涌现出来，反映出藏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现存大量的唐卡与铜造像中我们更容易感受到这一点。

四、清代宫廷中的藏传佛教神系资料（18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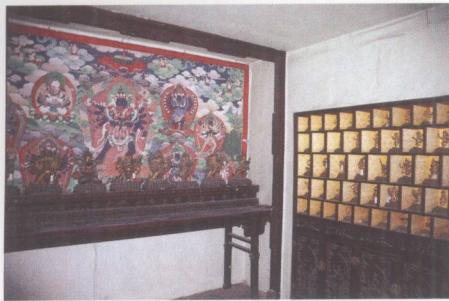
由于前期诸帝，尤其是乾隆帝的极力推崇，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极为兴盛，从经典到实物造像、寺庙建设均保存了大量的藏传佛教神系和图像学资料。康熙版的藏文大藏经的刊刻为清宫早期的造像准备了充分的图像资料和经典依据。但是清宫神系和图像学体系的完备则完全仰赖于乾隆帝的国师章嘉胡土克图的学识、努力和他与皇帝本人建立和保持的良好私人关系。他为清宫所编辑的最重要的图像学著作即是《诸佛菩萨圣像赞》²⁴。

德国学者瓦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发表了此图像集，并将前言和赞词完整地刊行出来。《诸佛菩萨圣像赞·前言》为此书编者以及刊刻年代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根据其记载并结合内务府档案，作者确凿无疑是三世章嘉国师本人。此书最初只是一个佛名号辑录，编成于乾隆十四年以前，其绘本于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完成（现未见保存），清宫依此做成铜镀金阴阳佛模，乾隆帝将阴佛模和模制的泥佛（擦擦佛）赐给了庄亲王允禄，庄亲王据此绘编成图册，绘制时间当在乾隆二十年之后²⁵。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图像即是庄亲王所绘的本子。

在此集中，章嘉国师对诸尊进行了详细而明确的分类（详见注25），共分为二十



《诸佛菩萨圣像赞》（18世纪上半叶 美国哈佛大学）



梵华楼楼上无上瑜伽品母续（乾隆时期 故宫）

三类，这种分类是在《三百佛像集》的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进，如将单尊神与曼陀罗的诸神结合起来编排，很有创意。很多尊神的汉文名号都进行了重新翻译，而这些名号在清宫的唐卡、造像和各种题记中均可以见到被普遍使用。最明显的是大黑天被译为勇保护法，这是只在宫廷使用的名号，另外很多的名号译名更加文雅，组神的名号长短一致，音律流畅，如二十一度母等，满、蒙、汉、藏四体文字佛号的书写显然针对了汉文阅读者。所有尊神特征清晰、绘工精细。这个图像集对宫廷佛教造像的研究最为便利，直接反映了章嘉国师本人的图像学与神系思想。虽然这个图像集的尊神不如《五百佛像集》收录全备，但是这毕竟是第一部完整的带汉文名号的藏传佛教图像集。

清宫资料中能与《五百佛像集》相提并论的、最丰富的部分还是克拉克书（详见注24）中第一部分的宝相楼资料，故宫梵华楼迄今仍保存着同样内容陈设的佛堂，清宫题记中此楼统称为妙吉祥大宝楼（Phun-sum tshogs-pa'i gtsug-lag-kang），清宫内务府的档案称六品佛楼。六品佛楼的主要特征是：七开间，上下两层，明间楼上供宗喀巴大师像，楼下供佛龛、塔或旃檀佛像；左右两边各三间，共六品间。楼上墙内所嵌小龛中分别供奉般若部、无上瑜伽部父续、母续、瑜伽部、事部、行部六品主要经典所出诸尊小铜佛像，每间各122尊，桌上供大红铜主尊像9尊，六间共786尊，全部刻写汉文名号，并有各品的品名。龛下另供诸品相应的法器和经典，楼下各间供各式佛塔一座，挂供相应的唐卡。上下六间每间均有满、蒙、汉、藏四体文字的题记，指明此间所供佛像或唐卡的内容及经典依据（表一）。

表一 六品佛楼上下各间所供主尊像(不含明间)

	第一间	第二间	第三间	第四间	第五间	第六间
品间	大乘般若品	无上阳体根本品	无上阴体根本品	瑜伽根本品	德行根本品	功行根本品
楼上所供主尊	释迦牟尼佛	密集不动金刚佛	上乐王佛	普慧毗卢佛	宏光显耀菩提佛	无量寿佛
楼下唐卡所供主尊	白勇保护法	六臂勇保护法	宫室勇保护法	吉祥天母护法	红勇保护法	骑狮勇保护法
楼下珐琅塔内所供主尊		密集不动金刚佛	上乐王佛	药师七佛	摩利支天	尊胜佛母

六品佛楼是清宫重要的一组建筑，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1757-1782年），清宫先后按照此模式修建和装修的六品佛楼达八处之多，宝相楼仅其中之一。但其中多数已面目全非，不为人知，或者夷为平地，被人遗忘²⁶。唯有故宫梵华楼基本完整。



梵华楼下无上瑜伽品母续间（乾隆时期 故宫）

本世纪初，六品佛楼的藏品已经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注目，其中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六品佛楼中的佛像大量流失，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²⁷。这些小佛像极易辨认，红铜铸造，大小相当（高25-30厘米），正面刻有“大清乾隆年敬造”和佛名，背面有“瑜伽根本”、“无上阳体根本”等六品字样，在世界很多博物馆、私人藏品及拍卖品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出版物中也刊出了不少照片，作为乾隆时期铜造像作品的代表²⁸。但引起学术界广泛注目的还是钢和泰的那批照片的发表²⁹。日本学者田中公明根据曼陀罗资料与密教的仪轨经典对《两种喇嘛教神系》中所给出的宝相楼诸佛的梵文佛号作了修订³⁰，这是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唯一的一篇与六品佛楼有关的论文。

印度学者帕特恰雅研究以后认为，梵华楼采用了《究竟瑜伽鬘》所描述的曼陀罗的资料。另外，它还采用了班禅《宝汇》的资料，因为其中很多的佛像并未使用《三百佛像集》的图像，而是与《五百佛像集》中《宝生》部分的图像多有相近之处。尽管缺乏肯定的资料说明此项工程是章嘉国师手笔，但笔者仍然认为，乾隆二十二年，即《三百佛像集》和《诸佛菩萨圣像赞》完成的时间，章嘉国师正当盛年，有能力和精力参阅西藏大量的成就法和曼陀罗资料，选择如此众多的尊神。根据统计，除去部分重复的尊神名，其特征各异的尊神至少不下750尊，远远超过《五百佛像集》的数目，更何况还要将每尊的藏文名号译成汉文，工程量之大可以想见，非章嘉国师而不能。

梵华楼的尊神多选自曼陀罗和一些重要的组合神。由于每一尊佛像正面有汉文佛名，背面有所属品间，这些铜造像成为藏传佛教造像中最系统和最重要的资料。根据这些造像我们不仅可以辨认出众多的佛像尊神，而且可以直接知道它归属于哪个品，哪个曼陀罗或组合神，这是以前任何图像学资料所不可能做到的。当然由于缺乏其它文字的名号，部分汉文名号或有意译或有音译，克拉克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有相当多的名号难以还原成梵文，这对认识尊神的身份和神格造成极大的障碍。田中公明依据新的曼陀罗资料解决了局部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的难点，如一些佛名还原成梵文或藏文是否正确、各品间究竟采用了哪些曼陀罗等都是今后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总之，六品佛楼内所供的六品铜佛像是清乾隆时期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而系统化的建构，是迄今最为丰富、最为庞大的藏传佛教图像学的宝库，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 释

¹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Cognate Tāntric Texts of Rituals, p.32, Firma K. L. Mukhopadhyay, Calcutta, 1987.

² [日本]佐佐木教悟、高崎直道、井野口泰淳、塚本启祥著，杨曾文、姚长寿译：《印度佛教史概说》第8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

³ 《成就法鬘》的全部经卷发表于印度格克瓦德东方丛书（Gaekwad's Oriental Series）第36卷和41卷，并附有详细的

内容介绍，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⁴ 此三百多种成就法中仅 55 种有作者名字，除去重复者，共 42 人。经帕特恰雅 (B. Bhattacharyya) 的考证，认为最早的一位是生活于 4 世纪瑜伽行派的著名学者无著 (Asaṅga)，最晚的作者是阿帕亚柯罗·笈多 (Abhayākarakupta) (1084-1130 年)。在现存的各种版本中，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贝叶经上有相当于 1165 年的尼泊尔纽瓦尔的年号，因此，此书的成书年代可以推定为 12 世纪中叶。这个丰富的成就法汇集文献始终受到西藏学者的重视，他们通过在印度学法带回很多的相关经典，并译成藏文，现在这些梵文本的大部分经典仍保存在《西藏大藏经》中。

⁵ 《究竟瑜伽鬘》作者是比哈尔地区 (Bihar) 著名的大寺超戒寺大班智达阿帕亚柯罗·笈多。他与孟加拉和比哈尔地区的波罗王朝 (Pāla Dynasty) 国王罗摩波罗 (Rāmapāla) 是同时代的人。此经典发表于格克瓦德东方丛书第 109 卷，并附有前言，详细介绍经典所含 26 个曼陀罗的概况。

⁶ 由于此书广泛流传，所以版本极多。在加德满都国立档案馆 (the National Archives, Kathmandu)，保存了几个版本的手卷，阿夏档案馆 (Asha Archives) 也保存了两个版本，加德满都的佛教图书馆也有手卷。在日本奈良保存了五个多写卷的胶片，京都大学图书馆还有三个写卷。1991 年，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尼泊尔的梵文手卷。

另外，阿旺洛桑却丹 (Ngag-dbang blo-bzang chos-brtan) 对此书作了详细的注疏。后由竹巴白玛嘎波 ('Brug-pa padma-dkar-po) (1152 - 1592 年) 译成藏文并加注，收在他的著述《瑜伽圆满鬘：法性现观无边利他》 (rNal-'byor rdzogs-pa'i 'phreng-ba ji-lta-ba'i mngon-rtogs gzhan-phan mtha-yas) 中。在西藏，此书成为曼陀罗图像学最重要的参考资料。在藏文大藏经 (Tibetan Tripitaka) 中收录了两个译注本。

此书在西方学者中的影响也很大。如摩尔曼 (M. T.de. Mallman) 于 1964 年有关文殊菩萨的研究文章 (M.T.de.Mallman, Étude iconographique sur mañjuśrī, Paris) 以及 1975 年完成的《怛特罗佛教图像学入门》 (Introduction à l'iconographie du Tantrisme bouddhique, Paris, 1975) 一书中均采用了此书的内容。

⁷ [日本]立川武藏等编：《法界マンダラの諸尊リスト》，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1989 年。

⁸ 布顿大师著，郭和卿译：《佛教史大宝藏论》第 302 - 332 页，民族出版社，1986 年。

⁹ 即：1. 《巴察百成就法》 (Pa-tshab sgrub-thabs brgya-rtsa)，也称为一百五十成就法，由巴察族的楚臣嘉措 (Tshul-khrims rgyal-mtshan) 译，包括 160 多个成就法；2. 《巴厘百成就法》 (Ba-ri sgrub-thabs brgya-rtsa)，由康区 (Khams) 巴厘地方的林钦扎 (Rin-chen-grags) (1138 - 1109? 年) 译，包括 94 个成就法；3. 《成就法集》 (sGrub-thabs kun-las btus-pa) (Sadhāna-Samuccaya)，由译师扎巴坚赞 (Grags-pa rgyal-mtshan) 译，有 240 多个成就法；4. 《诸天成就法》 (Lha so-so snatshogs-kyi sgrub-thabs)，杂集类，包括 60 多个成就法。其中第三部分《成就法集》和第四部分也可漫称为《成就法海》 (sGrub-thabs rgya-mtsho)。

¹⁰ 《成就法集》由班智达乔达摩室利 (Gautamarśrī) 带到萨迦寺本寺，经扎巴坚赞 (1147-1216 年) 译出，其中大部分成就法的梵文本都可见于《成就法鬘》。由于梵文本先后传入西藏，陆续译为藏文，故前后编排次序与《成就法鬘》不同，或有部分遗漏未译者。